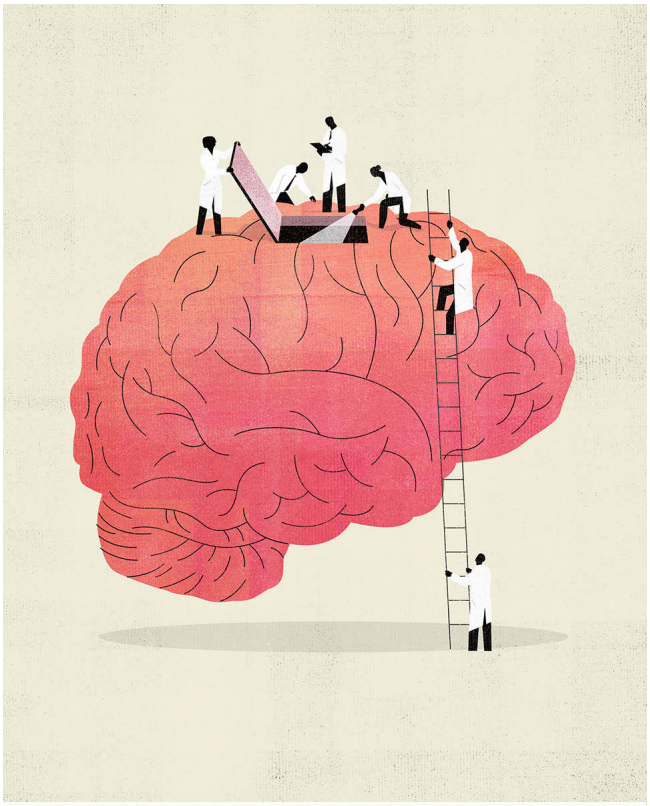
理解价值判断的作用

科学家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处于公共卫生政策矛盾争论的中心，这些争论针对的是像化学物质调控和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一般公众和从政界通常期待科学顾问以完全客观的态度看待问题。然而，这一期*EHP* [(122(7):647–650 (2014)]发表的一篇评论警示，科学研究本质上受到价值判断的影响，要最大限度地促进客观性、透明性、公众信任和良好政策的发展，研究者必须声明他们的利益和价值判断。



根据新的观点，价值判断不是个问题，缺乏透明度才是真正的症结。

© 2014 Keith Negley c/o theispot.com

去年欧盟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关于该委员会在内分泌干扰物方面的政策的初步综述引发了较大争议，作者就对此事件的观察发表了评论。事件源于18位知名科学家联名发表了一篇社论，批评欧盟委员会上述的报告使用了错误的推理方法。超过70名研究者在一系列评论中予以回应，提倡在某些情况下对科学和政策有更为清晰的区分。

“抛开科学细节不论，争论建议科学家应当在他们的研究中排除所有利益和价值判断的影响。”研究的第一作者Kevin Elliott、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如是说。越来越多的研究回顾了几世纪以来关于人类本质的哲学著作后认为：“价值判断确实影响人们的研究，”Elliott说，“对价值判断进行透明化处理可以带来很多好处。”

Elliott和合著者David Resnik，一位NIEHS的生物伦理学者，决定以欧盟委员会综述引起的争议说明个人理念如何植入研究的本质之中。他们解释说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反映出研究推定趋势。例如，对于欧盟委员会综述的争论焦点之一是在缺乏人体研究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假定来自动物毒理学研究的证据能够预测人体的效应。

当研究者选择证据标准做为健康相关政策制定的依据时，会进一步依赖自身的价值观对某些问题做出判断。类似问题如是否可以依据单纯的动物研究数据进行决策，或者是否同时需要动物和人体的研究数据。在这两种情况下，对证据的选择都取决于价值观对何种风险是是可以接受的认定，这种认定不仅仅只与科学有关。Elliott如此认为。

对欧盟委员会综述的批评者同时也探讨了内分泌干扰物是否有一个阈值浓度，一般认为低于此浓度时将不能观察到人体效应。“隐藏在上述争议后面的是对需要多少证据接受或拒绝一个假设的价值判断，”Elliott说。毒理学者一直以来都认可阈值假设，并要求大量证据来拒绝该假设。“与此同时，内分泌学者并不严格遵循毒理学研究范式，因此在抛弃阈值假设时并不要求有相应数量的证据。”

“许多科学分歧归结于某些规范相关而非事实相关的因素，而关于内分泌干扰物的这个争论是一个完美的例证，”渥太华大学的一名环境学者Scott Findlay说。他赞同Elliott和Resnik的观点，认为如果科学工作者提前声明他们的假设和利益冲突，并阐明多种科学解释的优缺点，可以使政策相关的科学争论变得更有成效和透明。

“讨论价值观的好处是人们可以借此开始思考相关事实，即他们是依据这些内在方面而做出的选择，这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这些因素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研究中的偏倚，”艾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一位毒理学者James Kehrer说。然而他也看到了除经济和就业相关的利益冲突之外的问题。“要知晓个体的核心价值观，很难不侵犯到个人隐私。”他说。

Findlay指出，关于假设和证据标准的讨论会使科学工作者们意识到他们所认为的科学矛盾事实上与科学无关。“如果真与科学无关，”他说，“科学工作者们并不比任何其他人处于更优越的位置来提出某个观点。”

Janet L. Pelley, 硕士，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市。她常为《化学与工程新闻》（*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生态与环境前沿》（*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撰稿。

译自*EHP* 122(7):A192 (2014)
翻译：吴少伟

***本文参考文献请浏览英文原文**

原文链接
http://dx.doi.org/10.1289/ehp.122-A192